

世界观

2011

《新周刊》主编

文匯出版社

陈丹青
齐邦媛
于坚
毕飞宇
熊培云
加藤嘉一
周云蓬
李健
李宇春
姚晨
李亚鹏
孟非
刘春
黄小茂
张发财
廖一梅
刘慈欣
梁鸿
张铁志
沈阳
春树
周鸿祎
秦海璐
朱哲琴
袁立
姚锡娟
向京
李华一
李小牧
孙中伦
梁咏琪
王虹

世界观

2011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观2011/《新周刊》主编.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496-0407-4

I. ①世… II. ①新… III. ①世界观—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9828号

世界观 2011

编 著 者/《新周刊》	出 版 人/桂国强
责任编辑/刘 刚	特约编辑/谭山山 刘 瑛
封面设计/万得福	版式设计/姚 冰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译文印刷厂

版 次/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32

字 数/160千

印 张/8.75

印 数/1-15 000

书 号/ISBN 978-7-5496-0407-4

定 价/27.00元

序

从19世纪初魏源提出“开眼看世界”，到上世纪80年代全中国人民疯狂地“走向世界”，我们好像一直不在世界里面，也因此，总想着往世界里钻。

到如今，等我们业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据说已经可以领跑世界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我们又远离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个我们称之为“内心”的世界。

有所得也有所失。这本来是极正常的事，但失掉的如果比得到的更重要，那多少有点不划算。

我们似乎总是在拼命地做着表面很靠谱但其实一点都不划算的事情。

一度，我们总觉得外面的世界比内心的世界重要，物质的东西比精神的东西重要；我们总以为快比慢好，高比低好，多比少好，大比小好……但结果呢，好像不是这样！

好在明白人越来越多了！虽然人与人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观点也越来越纷杂，但大家还是有一个共识：如果你丢掉了自己内心，就算拥有了整个世界，你其实还是一无所有！

三年前，《新周刊》创办“世界观”这个栏目，其目的，就是让大家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内心的这个世界，并努力在其中找回那个一度迷失的自我。

收在书里的这些访谈，都是些明白人的心得，你或许不一定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他们朝向自我内心深处的注视和探索，相信会对大家有启发。

是为序。

《新周刊》副主编 周可

目 录

序

北岛：你得跟自己较劲，你得跟自己过不去	002
陈丹青：我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010
齐邦媛：我的人生无大怒也无大乐	020
于坚：我们像灰尘一样被赶到了大地上	026
毕飞宇：外部不停地在建，内心不停地在拆迁	036
熊培云：这个世界不是我搞坏的	044
加藤嘉一：一个坚持不了原则的男人，别指望有女人...	052
周云蓬：人应该像蚂蚁一样专注地解决问题	060
李健：我要和生活平起平坐	068
李宇春：今年是我出道第六年	076
姚晨：生活给我什么，我就接着	084
李亚鹏：40岁，我找到了我的事业	092

孟非：生活从下班开始.....	100
刘春：超越欲望的方式就是实现欲望.....	108
黄小茂：有勇气面对以前，你就是成熟的.....	116
张发财：活着就是尴尬.....	124
廖一梅：伪善是对爱最大的戕害.....	132
刘慈欣：只有在科幻里，我才是个理想主义者.....	140
梁鸿：每个住在城市的人都应该有原罪感.....	148
张铁志：我信仰爱情，我还有激情.....	156
沈阳：宅在家里也能改变社会.....	164
春树：村上春树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	172
周鸿祎：不要把我描绘成一个斗士.....	180
秦海璐：我们只是走在寻找爱情的道路上.....	188
朱哲琴：我连一双翅膀都没有，我对自己很不满意.....	196
袁立：我不崇拜什么演员.....	204
姚锡娟：我只是一个朗读者.....	212
向京：在现实中，我是一个逃避者.....	220
李华一：心中有净土，才会画出净土.....	228
李小牧：不像漫画那样顺顺利利的，才是人生.....	236
孙中伦：我不是你们想的坏小孩.....	244
梁咏琪：嫁个好人好过嫁个有钱人.....	252
王虹：如果有三天光明，我想看看我的紫砂壶.....	260

世界观比世界大。



北岛：你得跟自己较劲，你得跟自己过不去

1949 年生于北京。原名赵振开。1970 年开始写诗，1978 年与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志。“朦胧诗”代表诗人。旅居国外多年，2007 年起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这几年，世界发生了大的变化。尤其是来到香港后，这个感觉更强化了。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从 21 世纪开始是个转折点。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有些迷失，就像一个人在黑暗中待太久了，你不知道往哪儿走。

所谓人的自由，其实是某种悖论，我早年写过这样的诗句：“自由不过是 / 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同谋》）而

猎人与猎物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即猎物也可能变成猎人——二者之间有某种同谋关系。在物质主义的时代也是如此——出发的时候还自以为是猎人，转眼就成了猎物。

一个人的勇敢是很多因素造成的。1978年，由于历史的转机，也由于我个人生活中的不幸事件，我对危险并没特别在意，认为生命没那么重要，做好冒一切风险的准备。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关键是如何尽量把这个时代的细节全部展示出来，历史的复杂性往往在文学虚构或历史陈述中被简单化了。

富人，他会请你吃饭一掷千金，而当你让他为文学杂志捐款，他就开始装糊涂了。这里面有富人的心态，请吃饭是一种仪式，是对他们行使金钱权力的一种仪式。

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不适应，我们要反抗那个时代，而在当今的时代肯定也不适应，这是一个作家和一个时代的紧张的关系。如果你感到适应了舒服了，那就有问题了。我们从来没想美化那个年代的社会，那个时代是非常压抑的，但正是由于反抗，生命才体现了它的价值。在这样的压力下，个人必须强大到可以跟时代对抗，才会释放出自己的所有能量。

走在多种潮流中，我们在跨越界限。保留身份的多重性，没有必要去确认一种身份，那反倒是一种特权——不断越界，就是不断从不同角度对世界发言，这就是漂泊者的特权。

人生冷暖，许多事尽可原谅，但某些历史事实却非说不可，要敢于说出这个世界的过失与危机，并为自己的话承担责任。对于大历史来说，有没有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人在这昏梦之外。

怎么能够找到一种积蓄能量的方式，这让我感到茫然。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传统。比如当今以娱乐主导的商业化，进一步瓦解了诗歌。正如我说过的，在极权社会，个人在与社会的对抗中获得能量，积蓄能量的方式就是诗歌，这有点儿像独唱。在商业化社会，个人在与社会的妥协中消减能量，导致某种类型化的合唱或轮唱。那是另外一种艺术（如果还能算艺术的话）：无聊、单调，自哀自怜。比如所谓“白领文化”，他们找到新的疏导方式，释放了商业化时代的能量。完全不需要借助诗歌，因为他们不是积蓄能量，而是如何以最快最轻松的方式消耗能量。

我跟我女儿这一代的年轻人有接触，他们对物质生活感到厌倦，对新时代有了反省和批判精神。这是一个很好的征兆。我认为这世界就像钟摆，走到一个极端必然会摆向另一个极端。这是一个积蓄的过程，正如闪电，要达到爆发的程度才能转换为闪电。闪电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因为有乌云，需要沉积、对峙和撞击，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发生转换。

我们这代人的写作和“文革”有很大关系，正好在中国文化走向尽头时绝处逢生。所谓“工人教育知识分子”，指的是我们这些本来没有什么知识准备的工人，却由我们来发起新的文学运动。就这一点来说，尤其是我自己，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和知识准备，仓促上阵。因此这一文学运动带有明显的硬伤。虽说这是历史的契机，我们抓住了，但深感力不从心。

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是系统性的，外在的知识；还有另外一种知识，是内在的知识。诗歌来自内在的知识，和灵魂有关的知识。要说两种系统兼备是很困难的。我们的出现是在那个知识系统出了毛病的时候，反倒可能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出路。

我教过的美国学生往往会对创作产生幻觉，认为只要经过系统化的训练就可以成为好作家。我在上课的头一天就说明这是不可能的。按美国诗人加里·施奈德的说法，最多是得到一张打猎许可证而已。唯一可教的就是如何阅读与欣赏诗歌，原创的东西是没办法教的。

中国也开始学美国，人们想通过写作课成为好作家，这是一种幻想，而且有很大的毒害作用。创作这门手艺是很神秘的，来自每个人的内心。每个人能走多远是无法预料的，外部引导没有多大用处。

我这几年写得很慢，这是有意识的。当今社会一切都变化得太快了，人们完全忽略了过去。人们在这种忽略中匆匆奔向死亡。而我恰恰想通过“历史叙述中的个人记忆”来重新恢复某种质感。写作是一种抚慰个人痛苦的过程。其实每个作家都要随时提醒自己，写到一定程度就应转换或放弃。我在写作中寻找的新方向是，尽量把速度放慢，扩大细节，重新构置个人想象的经验。

在汉语写作中，包括散文写作中，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传统？依我看，恰恰主流之外的某些作家，倒是留下了好作品。比如说汪曾祺，他就是一个主流之外的作家，他反倒留下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文化遗产。而属于主流文化的作家，我不愿意指谁的名字，我相信大都会被时间所淘汰所遗忘。上一代还有一个重要作家，就是高尔泰，他的《寻找家园》是他们那代人留下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作家其实就跟蛀书虫一样，需要的是黑暗和孤独，如果总在光天化日下曝光，是非常危险的。

我这十年的时间，写诗写得很少，感觉有点不务正业。最初写散文是出于生活的压力，为了赚钱、为了养家。但后来和经济没关系了，就是写上瘾了，写得也挺顺畅的。散文是大家容易说好的东西，也的确是得到了朋友和亲人的赞誉。

这对一个作家是危险的，就像我谈到的和自己的敌意——你得跟自己较劲，你得跟自己过不去——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写散文应该有意识地停掉。诗歌需要几乎全力以赴来写，而且对我来说更有挑战性，需要克服更多的苦难和障碍。我现在转向诗歌，就是要跟自己较这个劲。诗歌像修行，要保持内心的封闭状态，才能和自己有深入对话。

对我来说，现阶段相对来说是一个平静时期，和二十多年的漂泊生活相比，我从来没有这么稳定过。但青春的冲动在我内心里依然非常强烈，我时时能感觉到它对我的冲击，这是我停止散文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还远远没把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它最好的形式就是诗歌。

上世纪90年代是我诗歌的一个高峰，我在那个时候也感到一种危机，就是写得太多了。写作常常会产生惯性，你会突然意识到你写的东西是没有新意的，是一种重复。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末，记得当时接受《书城》的一个采访，我就提到要放慢写诗的速度。就跟我现在面临散文的问题一样，突然警告自己，要小心一点，不要重复。

我说诗歌和青春联系在一起，并不是指年龄，而是青春的激情。我觉得我依然保存着青春的热情，看我现在的诗，会发现激情和愤怒依然存在。不同的是，我的人生经验和语言经验丰富了。就像陈敬容所说的，老去的是时间。我们没有真

正变老,我认为我自己从内心里并没有老。

现在的问题就是,孩子们都没有青春。这是物质主义时代很悲惨的一个结果。我经常看到孩子们暮气沉沉的,包括我教的一些学生也是这样,他们对世界没有好奇心,甚至没有记忆。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让他们写童年生活的记忆,他们没有细节。怎么可能没有呢?再怎么样,也会有不同的记忆。这点真的让我感到非常沮丧——他们虽然年轻,但是没有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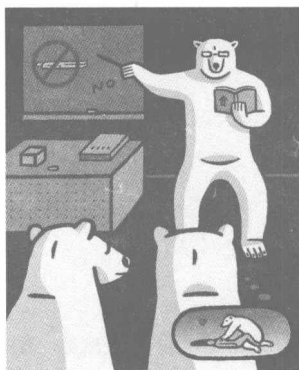
(采访 / 胡赳赳、丁晓洁)

采访手记

北岛出现在香港书展的名家讲座上,依然是一贯的浅灰色西装,却背一个双肩书包。

他当天演讲的题目叫“古老的敌意”,早在2005年出版的诗歌翻译文集《时间的玫瑰》中,北岛就特别提及里尔克《安魂曲》的这句诗: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

“作家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职业,这样的讲座,如果不是我的编辑逼着我,我根本不愿意来。因为我不需要粉丝,我是反粉丝的。”面对读者提问时,北岛说了这么一句。尽管如此,讲座结束后索求签名的队伍还是挤满了整个走廊,他们中四分之三的人专程从内地赶来,有人尴尬地说:“虽然你是反粉丝的,但我从很早之前就是你的粉丝了。”更多人则激动地要求他在扉页写下《回答》中那句著名格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陈丹青：我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953 年生于上海。1978 年以同等学力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录取。1980 年毕业留校，并以油画《西藏组画》一举成名。1982 年赴纽约定居。2000 年回国，受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04 年辞职。现定居北京。

十年前的陈丹青跟这十年来的陈丹青是两个人。你看我在这个房间里画画跟我在外面露脸是不一样的。我只是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

无非两件事改变了我的所谓身份：一个就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先是王安忆的先生——《音乐爱好者》杂志的主编，要我给他写点音乐的文章，从此我就开始写作了。到了 1997 年，有个出版社说要出一套书，类似“海外华人艺术家谈艺录”这些，反正要我写本书出来，我又开始写了。出完以后，发